

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的话语建构

——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本考察*

罗 星

摘 要 列宁在领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曾与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围绕纪律建设的原则和理念展开争论。1920 年,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纪律而不是自发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而不是“强迫”的纪律,是“长成的”纪律而不是“做成的”纪律,是来自人民群众中的纪律而不是少数人密谋的纪律。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话语构建,对推动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纪律建设提供根本方向;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提升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不断超越资本逻辑,改善纪律运行的外部环境;践行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强化纪律执行的人民性。

关键词 纪律 自觉 党的领导 人民性

作者罗星,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建教研部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7)。

尽管现代政党的产生动因各不相同,有的依靠组织党员赢得几年一次的选举,有的通过动员民众开展体制外革命以再造政权,但不可否认纪律在政党组织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①正如韦伯指出,不同于宗派,现代政党是“民主、普选权、赢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性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这两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产物。”^②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纪律在政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严明的纪律成为其在组织结构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作为“新型政党”的重要奥秘所在。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撰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幼稚病》)一文,不仅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表现、产生形式及危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进行精辟阐释,还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科学内

涵、运行机理、实践要求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1920 年 6 月俄文版出版后,紧接着以德、英、法、意的翻译本同时在柏林、汉堡、纽约等地出版,这在列宁的论著中是比较罕见的。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上若干争论,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话语体系,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思路 and 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纪律建设理念的争论:关于纪律建设的几种分歧性观点

采用什么样的组织领导制度来建立政党,并不取决于政党自身的主观意图和愿景,更多受制于政党自身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原则的创建过程,既是一个批判性地借鉴人类历史上各类组织领导制度文明成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理论争鸣、审时度势、随着实践变化不断创新完善

* 本文是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课题“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研究”(项目编号:21LLZZB100)的阶段性成果。

的过程。^③正如列宁在《幼稚病》中指出：“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④因此，对列宁纪律建设思想的理解要回溯到整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去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设计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时，一方面强调充分发展民主，保障党员权利，避免把政党建设成为少数人的密谋组织，另一方面也对党内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予以批判，强调严格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⑤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列宁一开始就把健全组织体系、严格党的纪律与取得革命胜利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革命胜利中，除了组织和纪律，没有别的武器。也正因如此，其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主张遭到马尔托夫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党不过是各个自治委员会的总和，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于整体，他们攻击集中制是“官僚主义”，会把党变成“大工厂”，把党员变为“螺丝钉”，将列宁严格党的纪律的主张污蔑为要在党内推行“农奴制”。同样，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的一部分“左派”共产党人，他们虽然充满着革命热情，但对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应该把党建立成为一个“绝对民主”的机构，动辄提出“打倒领袖”“摧毁政府”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反对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

虽然普列汉诺夫曾经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马尔托夫的主张，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政党，肯定了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但在如何严格党的纪律问题上，其与列宁的观点产生了较大分歧。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党的纪律不应该仅仅依靠服

从和强迫来执行，“我们所追求的纪律全不是监狱里盛行的那种纪律。士兵之服从出于强迫；我们之执行（当我们执行时）党的纪律则出于良好的意志。……这种意志是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影响巩固起来的。……在这些影响中服从的要求不占首要地位。”^⑥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党的纪律不能过分严苛，维持纪律只能凭借“良好的意志”，甚至提出“为了支持和巩固纪律，有时对破坏纪律的行为闭着一只眼是有益的”，^⑦甚至把列宁严明党的纪律的观点比喻为“套在我们党脖子上的绞索”和“波拿巴主义”。1904年7月，卢森堡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集中阐释了其对组织和纪律问题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卢森堡对列宁关于严明纪律的主张进行批评。她虽然肯定集中和纪律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意义，但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纪律是“表现在工人党的纲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意志不断化为政治行动的历史工具，”^⑧纪律只能建立在党员自愿服从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关于维持纪律依赖党员自觉性、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理念从原则上看是正确的，但由于俄国处于专制统治下，文化相对落后，仅仅依赖自觉性和发展党内民主很难维持铁的纪律，而削弱党的纪律的行为会对党的事业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当时俄国的政治生态下，只有突出革命者思想的、组织的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主动作用，才能使西方的社会主义观念能够转化成为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者直接运用的有效工具。^⑨纪律建设上出现的各种思潮，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明纪律的种种污蔑，呼唤有一部著作，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体系予以建构，以回应这些问题。

二、纪律建设话语的建构：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科学内涵的论述

在长期以来对列宁纪律建设思想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列宁大量关于纪律建设重要性的论述，但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科

学内涵,包括纪律何以生成、以何维持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正如列宁在《幼稚病》中所提醒人们的那样:“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⑩在这部文献中,列宁结合领导俄国政党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出了系统论述,回应了党内外各种关于纪律建设的争论。

(一)是党领导的纪律还是“自发”的纪律

无产阶级政党成员向组织服从的一个内在前提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组织,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为前提,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发展为使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引领其成员。^⑪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身出现了偏差,则势必会导致党的纪律偏离应有的方向。在《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得以维持的前提就在于“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⑫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关于依靠自我教育、党员觉悟提升来维持纪律的观点,蕴含着“自治”的萌芽,与其对当时的党情估计过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果没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领导,提供方向性的指引,没有对违纪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处分形成震慑效应,仅仅依靠“自发”形成的党的纪律很难得到坚持和维护。

(二)是“强迫”的纪律还是“自觉”的纪律

在政党内部形成严格的纪律不容易,将形成的纪律巩固和维护下去就更为困难。有的政党只依靠强制和惩戒的手段维持纪律,虽一时奏效,但最终难以持久。和其他组织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的重要特质是自觉性,其既不同于奴隶社会的“棍棒纪律”,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饥饿纪律”。卢森堡认为,资产阶级的纪律是“有无数手和腿的肉体在没有意志和思想的情况下随着指挥棒机械地做动

作,”^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应该是“自愿的相互配合”,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卢森堡看来,仅仅依赖于外在强制形成的纪律,势必在党内形成压迫感,最终导致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不利于党的发展。^⑭如果说在革命早期,列宁基于沙皇统治严酷的环境,在维持纪律上更多强调服从的一面,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其对纪律自觉性一面的强调愈发突出。列宁很早就指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⑮在1919年《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再次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⑯在《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回顾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其纪律之所以能够得到维系,关键“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他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⑰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维系,固然离不开强制性和服从性的措施予以保障,但如果真正想把这种纪律长期坚守下去,就必须依靠内部成员对政党纲领、意识形态的认同,把纪律变成一种自觉的遵守。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列宁在强调政党纪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以“行动一致”来使党组织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一方面以批评和讨论自由来保持党的机体活力。美国政治学者萨拜因曾经这样指出:“列宁在领导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坚信其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一是靠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而建立起来的物质上的统一,二是靠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或信念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列宁就是在这两块基石上开创其革命事业的。”^⑱

(三)是“做成的”纪律还是“长成的”纪律

从根本上说,政党的生存环境是影响其组织建制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专制独裁的国家愈

是强大，革命党的组织结构就愈是倾向于集权，以便集中强大的力量去制服敌人。^①同样，政党纪律的产生根源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不是仅凭想象就能搬来的“飞来峰”。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严明党的纪律，既靠无产阶级政党健全的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做成”纪律，更靠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为纪律“长成”提供条件和基础。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依靠政党本质的先进性、使命的崇高性、让社会个体成员为了实现自觉所信奉的主义和价值诉求加入政党，主动把自己的权利甚至生命让渡给组织，从而在组织内部形成了严密的契约关系和纪律约束。^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也为纪律的形成和训练孕育了基础和前提，是严格纪律的重要物质来源，而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列宁很早就文章中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论述严明纪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列宁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③列宁 1904 年《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指出，正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学校”里接受过训练，才能实现严明纪律。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强调，“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的。”^④在列宁看来，社会化大生产作为无产阶级严格纪律的重要训练场域，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重要来源和支撑。正是社会化大生产所造成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为无产阶级加强纪律建设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反之，小生产的大量存在，则容易滋生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观念，不利于纪律的巩固和维系。

（四）是来自群众的纪律还是少数人密谋的纪律

是依靠最广大多数群众开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还是依靠少数人密谋发动起义或者实行精英统治，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

他团体组织的一个重要标志。19 世纪的布朗基主义，主张通过高度集权化的密谋团体赢得革命胜利，遭到马克思的猛烈批判。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群众性政党，要自觉承担起联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在开展纪律建设的过程中要秉持群众观点，才能拥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引领力。早在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的时候，卢森堡就对列宁提出的集中制组织体系产生质疑，认为这种组织形态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等同于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在卢森堡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群众自身的事业，离开无产阶级自己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活动，任何社会主义事业只能是徒有虚名。^⑤因此，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要“为民主服务，也就是为个人相对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意志服务。”^⑥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确实基于发挥少数革命家的能动性提出了先锋队政党的理论，但他反复强调先锋队政党要密切联系群众^⑦，认为党的领导需要群众的支持予以巩固，“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⑧同样，在纪律建设问题上，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方面强调先锋队成员要有与普通群众相区别开来的“先进性”和“模范作用”，以高于普通公民的纪律标准来衡量，同时又要求将与密切联系群众作为维持纪律的重要条件。在《幼稚病》中列宁强调，在严明党的纪律的同时，要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并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在列宁看来，任何纪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实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

三、纪律建设经验的汲取：推进新时代纪律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列宁在《幼稚病》及相关文本中提出的加

强纪律建设的理念方法、思路举措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统一了全党，促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迅速壮大，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组织准备。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主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简称“二十一条”）》，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个政党都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集中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②7}这部纲领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党的领袖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具有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指明了方向，深刻影响了其党的建设的理念和思路。^{②8}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主义谱系的政党，推进纪律建设的理念、方法、路径都深受列宁建党理论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并从多个维度对纪律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考察列宁这部著作中对纪律建设的构想，对推进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纪律建设提供根本方向

一方面，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道路选择是否正确、政治纲领是否务实直接决定了纪律建设的效能。列宁强调纪律建设的前提是党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根本性的方向指引，使广大成员遵守纪律的目标指向不出偏差。另一方面，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加强党的建设一条重要经验。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服务、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纲领是其应有之义。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政治引领力和号召力。要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制定长短期战略方针，为纪律建

设奠定根本方向。

（二）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提升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自觉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纪律建设依靠自觉的观念，从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在党内培育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强调严格执纪保障党团结统一的同时，特别重视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性。瞿秋白强调，党的“铁的纪律并不排斥不同意见的争执和讨论，铁的纪律要建立在谨慎的批评和讨论基础上，才能成为自愿的服从。”^{②9}毛泽东要求“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秋毫无犯的纪律。”^{③0}陈云指出“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③1}中国共产党在加强纪律建设的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秉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实现“思想一致”基础上的组织上、行动上和纪律上的一致。国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虽然号称效仿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但未得其内在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导致其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要注重引导党员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将遵守纪律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同时要构建严格的执纪执法体系，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厉惩治违纪违法的党员，以制度的刚性保证纪律的遵守。

（三）不断超越资本逻辑，改善纪律运行的外部环境

纪律的维持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予以保障。列宁将社会化大生产作为无产阶级维护党的纪律的重要条件和支持，相反，小生产的滋生和蔓延则不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维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面临的困境，除了有部分党员理想信念缺失、党性修养不够的原因外，还与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滋生了诸多的利益冲突，

资本逻辑与党的组织理念产生某种程度的张力,导致统一思想、组织协调、严明纪律难度增加。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不仅要聚焦政党自身治理,更要从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出发,改善纪律运行的外部环境。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善于运用资本、驾驭资本,通过培育共产党人的“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要从消除腐败滋生土壤的角度出发,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有效降低党员干部被“围猎”的风险,为纪律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 践行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强化纪律执行的人民性

列宁在论述党的纪律建设过程中,提出纪律的维持与巩固要靠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点明了践行群众路线对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性。群众路线不仅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遵循和指南,其作用不只是简单组织和动员群众,而是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为党内各项活动的价值取向。纪律建设的出发点是在于严格管理党员使其最大限度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活动中,并依靠群众力量对其遵守纪律展开监督。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专设群众纪律一章,对破坏党群关系的行为予以处分,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群众性的内在特质。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要在密切党群关系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凝聚力,探索将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彰显纪律建设的价值追求。

注释:

① 石伟:《纪律塑造政党——基于政党变迁史的制度考察》,《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

② [德] 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译,《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③ 黄百炼:《民主集中制百年启思》,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8页。

④⑩⑫⑬《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5、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

社1963年版,第519页。

⑥⑦《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版,第7、7页。

⑧⑭《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64页。

⑨ 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⑪ 李海青等:《砥砺前行:引领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⑬《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⑭ 贾淑品:《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⑮《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⑯⑰《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

⑱ [美] 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页。

⑲ 陈明明:《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页。

⑳ 李海青:《百年大党: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45页。

㉑《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0页。

㉒ 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㉓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0页。

㉔《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㉖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㉗《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㉙《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责任编辑:何海根]